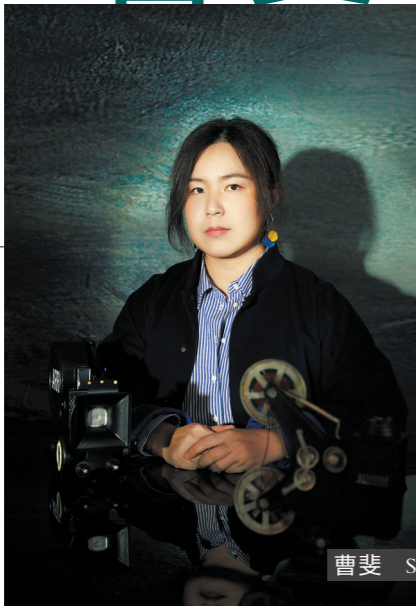


曹斐：不固化自我 没有落后的媒介 艺术在于塑造情感



曹斐 Sato 摄

图受访者提供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今年3月,当代艺术家曹斐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迄今为时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回顾展《曹斐:时代舞台》。展览以“南方游戏”“都市乐园”“车间内外”和“另类实境”4个主题展开,对曹斐过去20多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发展脉络进行集中呈现与梳理,引发了业界和观众的极大关注。

10月2日,曹斐回到故乡,在广州四海城·艺术长廊,以“回到南方”为主题,与听众一起探讨,人工智能、虚拟实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新面貌与新动向。活动现场还播放了曹斐团队打造的5分钟短片《无人之境》,讲述一位“行者”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现实走向虚拟、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故事。

身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曹斐出生于广州一个艺术之家,自幼受到雕塑家父亲曹崇恩及同为艺术教师的母亲廖慧兰的熏陶与培养。青年时代,曹斐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在MTV流行文化和手持DV发展的影响下,她创作了反映当代美院学生生活的影像作品《失调257》,从此走上艺术道路,进入国际视野,成为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知名中国艺术家。

“我是一名艺术家,也是一个普通人,我所经历的时代与所有观众都是一样的,只是我运用艺术的手段与大家共同的时代经历展现了出来。”在曹斐看来,这次展览并不是一场“回忆录”式的成果展,“时代”就像包罗万象的容器,而展览是艺术家与观众之间进行情感记忆交流的舞台。

近年来,影像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的“当红”形式。在曹斐看来,科技是没有情感的,但它可以用来塑造情感,而这正是时代赋予当代艺术家的任务之一。作为影像艺术最早的探索群体一员,曹斐运用影像、戏剧、虚拟现实技术和装置等多元媒介,以超现实的表现方法,反映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以及社会疾速发展对个体生活的影响。

时代与技术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艺术与艺术家如何自处?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曹斐说:“我最近第一次读村上春树的《1973年的弹子球》,这部小说成书于四十年前,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的处境、疏离和孤独从来没有改变。所以,重要的还是作者,以及他们留下的能震撼人类灵魂的作品。”

羊城晚报:今年在北京展出的“时代舞台”是您在国内的首次个展,也被认为是对您此前艺术的一次梳理和回望?

曹斐:“时代舞台”的策展人将展览分为了五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叫“南方游戏”,里面有很多作品都来自我在南方、在珠三角的生活经历和思考,比如2003年的作品《三元里》、2006年的《谁的乌托邦》等;而在展厅设计上,也体现了像工棚、茶餐厅、绿植这样的“南方符号”。

我在和策展人讨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才四十多岁,不能把展览做成八十岁那样的个人回顾展。所以展览最后没有像传统的回顾展那样有明确的时间线和既定的观展路径,而是任由观众自由选择与不同时间创作的作品偶遇。有人说这个展览无意间成为了“网红展”,我想,年轻一代人大多在线上成长起来,但他们也需要线下体验。甚至有人觉得,它像一个由艺术家创建出来的时代乐园。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 摄影 Stefan Chow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说,从您的展览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看见的“时代”。

曹斐:过去不少人对我的作品可能只停留于道听途说,而在本次展览中我几乎一次性地把所有作品拿了出来,也包括对我影响深远的个人成长物件。这些展品、物件都记录着我身处的时代,它们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的种种场景,因而触动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们。

时代是一个容器,包罗万象,我的初心是希望通过展览接触到更多普通观众。

搭建展厅的工头和我同年出生,他看见展出的我小时候听的音乐卡带、收藏的偶像老海报后,很感慨,无形中觉得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其实很近。观众可以看到,作为艺术家的我也是和大家在一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有的人成了白领、成了老师,有人成了工头,只是我成为了艺术家。

羊城晚报:您觉得“代际”对于艺术家和艺术创作而言,有怎样的影响?

曹斐:我现在担任不少奖项的评委,面对的参评者里90后已经是主力,甚至有00后的。从我过去被别人评,到今天评年轻人,艺术界永远追求新的人、新的东西、新的表达。在我看来,无论哪一代人都有其自身的语言表达、局限和价值观,都受到时代的塑造,没有好坏之分。现在更年轻



曹斐·欧宁《三元里》(2003,单频录像)

羊城晚报:今天影像已经成为艺术界常见的手段,甚至是潮流。影像艺术是否也形成了某种固化、俗成的定式?

曹斐:2000年我刚开始做影像的时候,大多展览还都主要由架上作品组成,出现一两个电视机,已经很难得。而今天,已经有人说抖音短视频这么风行,会不会对影像创作有冲击?事实上,无处不在的屏幕和影像已经将我们的视觉体验稀释了。今天年轻人的影像很多已经不是讲故事了,甚至它成为了新的“颜料”。

然而,如果现在说固化,可能为时尚早,相反影像将会更加普及,媒介的衍生产会成为拥有更多未来可能性的“颜料”。反而是艺术家不能“固化”自己,要往前走,找到准确表达我们当下的途径。但是,我们也并不能简单认为绘画、雕塑、摄影是“落后”的媒介,

一代的作品,艺术媒介已经发生了转变,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桌面时代”,则网络经验和美学很大程度上已经占据了他们的表达。

羊城晚报:“桌面时代”……但您常提到艺术创作要到“田野”去,为什么强调“田野”?

曹斐:艺术家要感知和表现世界的变化,就需要去“田野”,即现场,而不是停留在二手经验和屏幕经验。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通过视频、播客等等,但我们要不要去求证,要不要厘清信息和事实之间的误差?在体验、考察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转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我曾经到一些西方艺术院校访问,看见很多年轻创作者窝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足不出户、埋头“创作”,我给的建议是鼓励他们多出去走走、看看,在“田野”里可以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锻炼沟通的能力,增强我们协调自身和外部世界平衡关系的能力。

我年轻时候在广美上学都要下乡,要和村民们同吃同住,这是非常好的体验,通过与他们交流,了解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生存方式的差异。当艺术家

要表现一个对象,并不能靠凭空虚构出来。

羊城晚报:广美和广东是您出发的点。这里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曹斐:这里不得不提及我的父母,他们上一代艺术家用写实的、凝聚的方法表达我们的历史、英雄和伟人,我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也深深受益于此,亲眼目睹我父亲如何用表达的艺术方式去表现时代变迁。我的第一部DV机是父亲送给我的,我在美院的时候还没有影像专业,只有国、油、版、雕等传统专业。

很多人问我和我父母一辈有什么不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记录时代,我也在记录时代,媒介不过是一种手段,要表达的事情是一样的。

有人曾说我“乱棍打死老师傅”(笑)——不是电影科班却去做片子,不是摄影出身却拿了摄影奖。这可能跟我生于南方、长在艺术家家庭有很大关系,我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养分,这也让我的创作没有边界,不设限反而让人可以超越某些圈子里俗成的、先验的东西。

【虚拟创作如何使人得到共情】

只要你对自己使用的媒介有足够自信,做得足够好,艺术最终都是殊途同归,触动内心、通向灵魂的。我最近第一次读村上春树的《1973年的弹子球》,这部小说出现在四十年前,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类的处境、疏离和孤独从来没有改变。所以,重要的还是作者,以及他们留下的能震撼人类灵魂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在创作中与流量明星合作,使用VR、AR等新技术,甚至将作品放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高楼上。这些“破圈”之举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曹斐:当时我受委托在香港的地标最高的贸易大楼外表面上创作LED视频作品,最终我呈现了“吃豆人”,源自小时候玩的电子游戏,它能唤起很多80后同龄人共同记忆。

对我来说,这是超越美术馆的创作。到美术馆参观的人可能只有两三万,但维港的“屏幕”面向的是上百万人。对于一个普通的香港人,他不知道作品是曹斐的,并不重要;但在他某天下班,在巴士上,在渡轮上,看到这么一幕,想起小时候玩过的游戏,会心一笑,或惊讶,或好奇,对我而言已经足够。

像我和流量明星的合作,也不会把他们拍得有多完美、多好看,当这些作品出现在美术馆之外的公共场所,引发破圈的话题与讨论,可能会更有趣。

科技不一定有情感,但如何用虚拟创作使人得到共情呢?在VR作品《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我着重尝试让观众体验到来自虚拟媒介的情感叙述。对我而言,艺术就是塑造情感,无论这些情感是和过去关联的,还是连接未来的。

他卷入许多学术争论,活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锲而不舍,乐在其中



我和古远清最初相识,大概是三十年前。那时,我四十多岁,在武汉大学讲课,他来珞珈山宾馆见我,印象中当时还是青年助教,虽然素昧平生,却有一份亲近,原因是,当时我们都教写作。

在那朦胧诗的激烈辩论中,记得他是倾向于支持“崛起派”的,由此受到臧克家老先生的严厉批评,还把我 and 谢冕、孙玉石打成“北大派”。在某些见解上,我与古远清可谓所见略同。当然,他行文比较平和,尽可能保持公允,对论敌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不过就文章论文章,在我感觉中,似乎不算出色,从学术上说,很难看出有多大前途。但是,人蛮朴实,又很虚心,总算是同一战线的战友,我讲了一点鼓励的话,轻描淡写地提了一点意见。

文坛风云变幻,我本性难移,总是口无遮拦地卷入其中。刚从“崛起”论的围剿中解

脱出来,很快又投入刘再复和陈涌的主体性大论战中。后来连续五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文学创作论》,精力完全投入到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建构中去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又出国进修,讲学,古远清的名字不知不觉滑向记忆的边缘。不过,在海外华人文学圈中,也偶尔听说他在介绍、研究港台文学。直到1995年,我应邀到香港岭南学院访问研究,才发现他已经名满港台了。

在这以前,我对港台文学评论涉猎有限,看过一些对港台作家廉价的吹捧文章。后来由于朋友刘登翰的介绍,我读了一些古远清的文章,觉得与那些轻浮的鼓吹有所不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章中,往往有比较新颖的、大量的第一手信息,和那些浮光掠影的感想式的捧场文章相比,他的资料的系统性使我大开眼界,获益良多。

他卷入许多学术争论,活

□孙绍杰

跃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锲而不舍,乐在其中。从宏观上说,他批判过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从微观上说,他对于资源信息准确性的执着,颇使我惊异。针对一位相当权威学者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文学通史》,他指出,光是书名等方面的错误就不下十几处。他的严谨,他对学术资源准确性的追求,表现出某种一根筋的精神,使我十分震撼。有人由此称古远清为“学术警察”,他不在乎。古远清这种行为,与我喜欢挑剔文坛相似,因而我将他引为同调。这当然也引起圈子内学人颇为纷纭的评价,肆意贬低者不乏其人,但是,比之情绪性的议论,最为雄辩的是他私家治史,一人已写而不是编了9种文学史,有人称之为“古远清现象”,不为过。

乍看起来,他以创作丰富自乐,至今在海外内外出版了60多种著作(含编著)。但只要不

为门户之见所蔽,从最客观的意义上说,他在台湾甚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已经俨然自成一家。他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当代台湾文学概论》,均带有开创性。古远清所收罗的学术资源之广博和第一手材料的准确性,使得他的著作具有学术生命力。

如果把他的贡献,仅仅限定在资料的深厚积累上,可能是不够全面的。他的学术生命力还在于,将自己的学术观念,贯穿在他的诸多著作中,他的文化自信、学术坚韧,诚如一个访问者所说,表现了一种“文学研究的‘血性批评’风格”。

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尤其是这次读了他的近百万言的《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后,不得不说,当年第一次相见时觉得古远清在学术上缺乏前景的印象是看走了眼,如今承认这个错误,是令人十分愉快的。

古远清的“一根筋”精神

□林伦伦

比较研究的成果不多。可以说,对于粤东闽方言语音的一致性和内部差异的研究还很粗糙,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

林春雨、甘于恩的这本《广东东部闽方言语音地图集》,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其学术价值颇高,值得称道。作者在粤东五市选择了77个方言点进行了语音调查,绘制了声母图12幅、韵母图160幅、声调图16幅、分图4幅,基本上能够反映77个方言点的语音特征,选点精密和覆盖面完整。全书200多幅地图,每

个例字一图。而每一个字都是与古汉语音韵的对应规律有密切关系的典型例字。如果你懂得汉语音韵学知识又对粤东闽方言语音系统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根据这200多幅地图归纳出77个方言点的语音系统及其区别性特征。

从历时四年的77个方言点的田野调查、资料汇集、整理、分析,到每一张地图的绘制,可谓“十年磨一剑”。正是这种坚持,才使得广东的三大方言研究成果里,有了第一本语音地图集。

正是这种坚持,才使得广东的三大方言研究成果里,有了第一本语音地图集

广东省东部闽方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潮汕方言,属于汉语七大方言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与泉州话、厦门话、漳州话、台湾话、雷州话、海南话是同一个类别的。通常意义上的粤东闽方言区域范围,包括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汕尾市和梅州市的丰顺、惠州市的惠东部分地区,人口约1500万,东西海岸线长200多公里,南北部纵深也有近百千米,但中心区域是在“潮汕三市”——汕头市、潮州市和揭阳市。

这三市的潮汕话语言交

流没有问题,但口音差异却是明显的。大致是汕头市(潮阳区、潮南区、濠江区除外)、潮州市为一片(群众多称为“潮汕口音”),揭阳市区及揭东、揭西为一片(群众多称为“揭阳口音”),汕头市的潮阳区、潮南区,揭阳市的普宁市、惠来县为一片(群众多称为“潮普惠”口音)。有人以韩江口音、榕江口音和练江口音来表述,虽然缺乏科学性,但却有一定的自然地理表现力。其实,三片内部的口音差别也不小,边缘地区的闽语特点就更

这个职业,讲究“脚板子底下出新闻”,要迈得出去、吃得了苦,一步也不能省

用脚“踩”出来的新闻

□徐如俊

金秋时节,岭南来鸿。欣慰时平同志文集《独立思考》修订再版,包括他近期撰写的数篇理论文章一并编辑成册,诚挚表示祝贺!

转眼之间,我与时平同志相识已有十七年之久。当时他在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工作,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分工我联系华南分社。虽然仅有几个月时间,与时平同志接触的机会也少,但从一见面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2004年,他的文集《独立思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有一位同事评论说:“作为记者,时平的新闻作品毋宁说是用脚踩出来的。他担任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粤北记者站站长多年,几乎成年累月驱车山区。2002年春节期间,他还在韶关的山村采访水利工程。后来他写出的报道渗透着对村民的热爱。我想,少年时代的经历,培养了时平同农村、农民、普通劳动者的感情。”

那个时候,我们内部正在讨论,要提倡记者到生产、生活一线去,用心观察,用情体验,用功写作,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新闻工作者与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应当是水乳交融,不是条件越好距离越大,不能习惯于走到哪里都是坐下来听介绍,站起来要材料、回来后编报道。看到时平同志的《独立思考》一书,就有“榜样就在我们身边”的感觉。“脚踩式”采访,带着感情报道,不正是我们要提倡的吗?

2005年初春,时平同志随广东粤北石灰岩地区进村入户,采访了当地党委、政府为解决群众“燃料难”而大办沼气的长篇报道。报纸一经刊发,不仅省市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寄来感谢信,还引发了一位1996年参加革命的耄耋老人的高度评价。这位老人是原湛江市委书记慕君。他不顾年高体弱,执意

要时平同志陪他到粤北山区的两个“沼气村”现场考察。当时全馆正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华南分社将这个过程作为典型材料上报到报社。我认真向报社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推荐了这份材料,希望能从时平同志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二点可推广的经验。

新闻工作是一个艰苦复杂的崇高职业。这个职业,讲究“脚板子底下出新闻”,要迈得出去,吃得了苦,一步也不能省;要求不断积累知识、提高辨析能力,不能虚与委蛇给人看,而要求真务实、亲力亲为。“嚼别人嚼过的馒头不香”。新闻工作者能够受到社会的尊重,靠的就是在艰苦复杂的劳动面前不吝啬、不偷懒,总是把第一手材料和独立思考独特见解奉献出来。

2005年6月我离开人民日报社。2007年4月以后,时平同志也调离了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然而,不论走到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时平同志总是不忘自己的本色,坚持学习,深入思考,笔耕不辍。这次《独立思考》文集收入的、他近期撰写的《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一文,在学习强国广东平台转发,几天阅读量达37.5万人次,点赞达1.7万人次。在十四亿人口进入全面小康,数千万人口摆脱绝对贫困的历史时刻,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总结经验,所有媒体都在进行报道,时平同志一篇文章为什么能引来这么多阅读和点赞,是值得 we 们探讨的。

修订再版的《独立思考》,汇集了时平同志几十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努力和心血,记录了与时代一起进步的不凡历程。第22个记者节就要到了,时平同志出版《独立思考》,作为时平同志的同事和好友,我感到很有意义。